

李嘉慧

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至今已經是一個年頭，香港人在政治現實上為同一領土的「同胞」。但是這一年來，大部分內地人對香港作家董橋的文章，強調的仍然是生活在跟自身不同歷史文化背景地方的「他者」，對他的文章產生一種陌生和與眾不同的感覺。這就如內地人孟冰說：「讀董橋散文就好像與他坐在對面喝咖啡。那一定是個環境優雅的街邊小店也許董橋先生屬於海外華人的緣由，他的文思與我們大陸的許多作家有很多不同。他並不那麼激奮，也不高昂，更沒有那種我們從骨子裏透出來的沉重。也許，在一天當中，喝咖啡的時間只有 分鐘，也許， 分鐘就夠了？咖啡畢竟有一些苦澀，據說喝多了對心臟還不好。」¹

薩義德（Edward W. Said）曾指出，身份的建構需要在每一個具體的時代裏，「自我」和「他者」之間不斷互動、對話中確立，因為「想像中的地理和歷史，有助於精神通過把附近和遙遠地區之間的差異，加以戲劇化，從而強化對自身的感覺。」²，而這身份的建構過程必須首先承認「他者」存在的合理性，以及「自我」概念的相對性。中國內地人對董橋的文章，就是以這種「自我所沒有，而他者所有」的定位方式去進行理解，形成了「自我」對「他者」的文化身份想像和建構。根據文化研究理論家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指出，「文化」實現了空間的置換之後，其意義、意義的表述方式和實際被表述出來的意義都會發生變化，跟原來的「文化」不一樣，其中已經有所「轉化」和「超越」的「遑譯性」存在，所以「文化如何表意，又或者說通過『文化』究竟是甚麼被表述出來，變成了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³

就此，本文試圖綜合所有中國內地人發表於1997年及以後，至今共43篇跟董橋作品有關的期刊評論文章的意見內容，繼而從內地人接受和拒絕他文章中甚麼「遑譯性」的文化思想內容，以求探尋和歸納出內地人如何理解董橋作為「他者」的文字創作，以及建構其香港作家的文化身份想像。

首先，中國內地出版有關董橋的作品，大部分都是經過內地編者刪減或出版社篩選的選集，而且這些文章大多是董橋寫於1997年以後轉投《蘋果日報》之前的舊作。⁴所以，內地讀者便會有意無意間透過這些舊作選集，將「董橋」建構成為避免引起內地出版問題的文人雅士形象，已經不是在香港以報人身份，撰寫一些較有批判性專欄文章的公共知識份子形象了。換言之，董橋那些早年的作品成為了現今被內地人「凝視」（gaze）的對象。拉康（Jacques Lacan）指出，在想像的關係之下，自我如何被放置在他人的視覺領域之中，以及自我如何看待自己的立身處境，都是經由他人如何看待自我的眼光折射而成的。人總是會意會到他人與自我之間存在的關聯，通過這樣的帷幕（screen），來構成對自我的再現，也就是經由這樣的再現方式，「凝視」的關係和權力因此得以形成。所以，董橋那些「繡花式」的散文舊作

⁵，就成為了被內地人「凝視」的對象，對他進行了扭曲的描繪想像，建構了既真實又虛假，來自香港特區的「董橋」作家身份幻象。

內地人也認為董橋受制於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特區商業社會，不但在歷史文化經驗上跟「自我」有分別，導致他的文章大多欠缺深刻和厚重的社會性內容，沒有表現出對人類終極關懷意識和心靈高度的思想，而且他的創作多以市場為主導，表現自己閒適生活的「個人化」寫作，既講究精緻雕琢的文字，又追求有世俗趣味的思想內容。這就讓內地人建構出「董橋」是一個身處經濟富裕的香港資本主義社會，強調個人主義的思想文化，熱切追求滿足個人物質享受和過著優閒生活的小資產階級身份想像。因為內地的作品強調思想性的內容，指的是對重大社會歷史問題、人生問題有深刻理性的認識，是那種善於觸摸歷史、敢於面對現實的深層思考，也是那種閃爍著洞察真理的光輝的獨特見解，而不是董橋在文章中大多僅僅為讀者提供一般常識，又或對某一事件、某一生活細節的一般性感悟。在香港身兼《蘋果日報》社長的兩棲作家董橋，沒有經歷過內地的政治風波和社會苦難，所以他的創作沒有內地作品中深刻沉重的「苦難感」，只有現實庸碌生活中追求閒適自在的心態。

雖然董橋並非如內地人所構想的是「風雅得沒治了」的名流紳士⁶，一直在香港過著安逸舒適的生活。他在《雪憶》文中曾回想起自己從前的賣文困窘處境⁷，又說：「我的經歷不見得很順利。我也經歷過不少風波，但我會儘量避免在文章中流露太多個人過去不愉快的東西。」⁸可是，董橋跟內地作家所經歷的與個人生死榮辱、國家興亡有關的「大苦難」相比，他所經歷的顯然只是個人生活上的「小苦難」，其作品的思想內容也自然顯得瑣碎輕薄。

在中國內地，董橋的散文始於90年代才以選集的形式出版，而此時正值中國社會以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消費文化逐漸成型。群眾不但開始仰慕中產階級講究優雅精緻的生活方式，而且董橋在文章中講求閒適趣味的個人化創作，也與當時內地社會長期強調深刻思想性內容的作品相比，明顯存在很大的差異。這就使當時的內地讀者對來自香港的董橋文章，擺脫了思想內容沉重的社會性負擔，不期然產生一種久違的新鮮感。這就如內地人黃集偉說：「對當時大多數內地讀者而言，『董橋』跟『地下室』也差不多——一個地地道道的陌生人。不過，在我來說，董橋恰恰因為陌生而讓我好奇」。⁹

對於董橋在文中引用「外語」，可能只是給香港讀者一種精通外國文學和英語的知識份子感覺，甚或帶點賣弄的自負傲氣。因為一般香港人未必會有這麼強的外語能力，讀遍他提及的所有外國文學作品。但是，董橋在文中的「外語」能夠給當時的內地讀者一種貼近西方發達社會的感覺。因為他在說話中夾雜「洋涇濱」英語，以及在行文時對外國文學作品如數家珍，恰恰切合了內地人認為董橋是來自前英國殖民地香港的語言和寫作習慣特性，又符合了當時內地讀者所仰慕的中產階級生活應有的外語能力的想像，也帶來跟內地作品行文多是純粹的中文不一樣的陌生感和新鮮感。許多內地的評論文章也沒有深入探討董橋作品中引用「外語」的問題，只是泛泛而談，反之在香港和台灣對這方面的研究較多，比如台灣的楊照認為：「這裏透出來的，是一種極有意思的東方化了的snobbishness。Snob、snobbish在中文裏很難翻，因為這字背後含藏的貴族品味意義很難用三言兩語表達清楚。勉強用中文說，snob表現了一份『我識貨你卻不識貨』的差別心，以『我識貨而你不識貨』的態度鄙視、睥睨其他人。」¹⁰

還有，內地人也會刻意從經歷過英國殖民統治的香港作家董橋身上，努力尋找跟自己一直身處祖國文化，與生俱來就是「純正中國人」的創作有所不同，一種對中國母體油然而生的

「尋根」文化鄉愁情緒。換句話說，董橋是被內地人看作是跟自己本身不同的「他者」香港作家，他所以在文章中刻意借用古玩意或穿插一些古文，就是為了表達對中國國家民族的祖國文化鄉愁。而且，董橋在文章中寫中國的時候就顯得很「中國」，浸潤著舊式傳統思想文化；寫西方的時候又顯得很「香港」，飽含著新式西方思想文化。總之，內地的評論認為董橋只能在文章中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一種隔岸追思的懷鄉情緒，跟內地「純正的中國作家」能夠「自然賦予」作品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情感表現相異。

其實，董橋曾說自己的嗜好是收藏中國文人的古玩意，所以繼而偏好中國的舊人物和舊文化。¹¹他在《愛閑說》一文中更提及自己喜愛從這些古玩意中，尋找古代文人心靈上的「閒適」。¹²這是他作為長期遠離祖國的香港作家，一方面迷戀中國傳統文化和厭惡中國政權實體，另一方面又崇尚英國優雅文化和嫌棄英國殖民統治，兩種文化制度在互相糾纏的過程中產生了矛盾交混的心理狀態。所以，董橋受著這「愛恨交織」的心態所影響，對「遙想」的中國文化進行個人喜愛憎惡的選取，結果最後只剩下自己對中國舊式文人雅士的「狹義」傳統精英文化的嚮往。由此看來，董橋只是在文章中以「個人愛好」為題材，更在其中引用一些自己喜歡的古文，從而獲得與眾不同的「個人化閒適」趣味娛樂，表達了個人只對中國傳統文人雅士的「狹義」精英文化的偏愛，並非必然刻意在文章中表現自己對中國國家民族「廣義」的祖國文化鄉愁。

可是，90年代初在中國內地，一個與社會文化變革有密切關係的中產階級讀者群逐漸形成，而「閒適文化」又因符合了他們的審美情趣而悄然興起。董橋借用了許多古畫竹雕等五花八門的古玩意入文，又在其中隨意穿插一些古文，不但滿足了中產階級讀者群的審美需要，也讓內地讀者建構出心目中所仰慕的中產階級，應該是有高級生活品味的閒適情趣，以及中國傳統文人雅士的文學和文化修養。在內地的市場經濟文化開始佔據社會生活的中心位置，跟從前主流的中心價值信仰出現了斷裂危機的時候，市場上一些溫和、懷舊和消閒性的作品便能夠適當地填補內地讀者的精神空白需要，滿足了強調個人享受，追求「閒適文化」的時尚消費。因此，董橋的文章原來只是作為曾經歷過殖民統治的香港作家，只偏愛古玩意和舊式文人文化的「狹義」中國傳統精英文化，講求個人心靈上的閒適趣味，又摒棄「廣義」中國國家民族文化的文字創作，卻轉變成為內地讀者對「中產階級身份」的「個性化閒適消費」。鮑德里亞（Jean Baudillard）認為，在一個商品化的社會裏，個體的價值和階級地位是由「個性化消費」來定位的。人們不知道自己消費的真正需要，只知道因為別人擁有，而自己也得「個性化消費」，以求代表同時擁有某種階級價值。對於內地的讀者而言，董橋在文章中引用一些古文，又談及自己的古董收藏，流露出中國文人附庸風雅的高級閒適趣味，迎合了內地人對中產階級的身份想像——中產階級應該是與擁有豐富的中國文學和文化修養，以及高收入的經濟實力密切相關，但兩者其實都不是一般人容易能及。所以，內地讀者便有意無意間對董橋建構出「中產階級」的社會文化身份，繼而進行「個性化消費」，渴望能夠透過消費閱讀，獲得或了解另一種階級身份的想像。

董橋對此也回應說：「中國現在已經很進步了，大陸現在的生活水準與香港的距離並不太大。我想我的文章主要是打開了世界之窗，使大陸中產階級看到了不少別的東西。我承認我自己是小資產階級，我想這種心態也不用改了。」¹³由此看來，董橋也欣然接受內地人對其建構的「香港小資產階級」社會身份。同時，內地人大多懵然不知董橋所謂的「小資產階級」文章，其實是他個人摒棄「廣義」的中國國家民族文化，只選取「狹義」的中國傳統精英文化，而這又恰恰是董橋作為香港作家對中國獨有的「愛恨交織」情感表現。

還有，內地的評論也會從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特區社會，推論出董橋身上某些思想感情

是分舊式的中國文化鄉愁，彼此共同分享著傳統的中華民族文化。但因為董橋的文章受制於香港社會的生活環境和意識形態立場，所以他在取材、立意和表達方式各方面，都以市場為主導，顯得非常個人化和情趣化，欠缺深刻的思想性內容。其實，內地跟香港的歷史文化背景不一樣，導致彼此對文學價值的創作標準也產生差異、偏轉和倒置。內地強調文學在內容思想上的深刻獨到，但香港則強調文學在形式或內容上的審美藝術。一直以來，香港的作家受制於現實的生活環境，大部分的創作都沒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沉重思想內容負擔，反而退回「窮則獨善其身」的崇尚個人化，以自我為中心的文學寫作特點。香港的作家即使在回歸中國以後，也沒有因為政治身份的轉變而肩負起「以天下為己任」的思想內容責任，將自我崇高化和英雄化。董橋的個人化「閒適性」文章在商品大潮的衝擊裏，從閒適的清高心態中追求個人安身立命之所。這就好像他說：「在人文傳統不斷受到新進科技和市場經濟所挑釁的年代，在人情世故不斷遭遇涼薄風氣和庸俗趣味而貶值的年代，傷春悲秋無補於振興尊嚴；積極感受春寒、體認秋涼，畢竟是永不過時的個人淨化的動力。」¹⁴

此外，在內地人心目中，董橋不但囿於自身的經歷和生活背景，而且文章篇幅大多是短小精悍。所以，他的文章難以深入刻畫具宏大主題思想的社會性內容，顯得只是一些心態雅致而輕鬆，趣味唯美而休閒的「小女人」創作。可是，如果將董橋那些短小精悍的專欄文章放在香港生存的大環境裏，他的作品確實能夠配合香港社會急速的生活節奏規律，在每天有限的字數裏「不再刻意追求文章裏的學、識和情了。」¹⁵因為董橋熟諳在香港社會從事創作「有一點可以肯定，我不會去寫大部頭的著作，長篇大論有誰看呢？」¹⁶，這就明顯跟內地作家的生存處境和價值標準不一樣了。由此可見，董橋與內地作家相比，他對於人生的感悟和體驗都被淹沒在瑣碎的生活之中，這就導致情感的平庸和文章格局的逼仄。這凸顯了他在文章中抒情的心理空間較為狹窄，也是在香港從事創作的限制和欠缺。

最後，內地的評論對董橋在自己文章中表示不喜歡魯迅也提出異議，認為出身於世俗娛樂文化盛行的香港商業社會的董橋，不會懂得欣賞魯迅作品中有批判黑暗現實社會的創作。其實，董橋在自己文章中表示不喜歡魯迅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在海外長大，自然不會受到內地的文學價值觀所影響，也沒有跟內地人一樣的歷史文化背景經歷，他喜愛的作家和文章只是隨心所欲。所以，董橋認為：「魯迅的小說寫得很好，但我不喜歡他的雜文，戰鬥力太強了。人生是一種很快樂的事，為甚麼整天要跟人家吵架呢？那是很煞風景的。而且，我覺得筆端不能太兇，要有風度。我不喜歡跟人家筆戰。文章寫得太兇不行，這是很重要的。」¹⁷

綜合而言，中國內地人因為「凝視」董橋作為香港「他者」的創作，從而體現出內地人如何理解他的文章，並在當中揭示了存在著許多「遙譯性」的文化思想內容，最後建構出自己心目中香港作家「董橋」的文化身份想像。自我認同的文化身份不只是內部孤立的狀態中建構而成，同時也需要通過與他者的對話協商形成。這就如薩義德說：「在我看來，身份最終都是一種建構——牽涉到與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構，而且總是牽涉到對與『我們』不同的特質的不斷闡釋和再闡釋。每一時代和社會都重新創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決非靜止的東西，而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種人為建構的歷史、社會、學術和政治過程——簡而言之，身份的建構與每一社會中的權力運作密切相關，因此決不是一種純學術的隨想（woolgathering）。」¹⁸由此看來，香港作家「董橋」這個概念並不是從前在某個時間和空間給定的東西，而是其他人言及，以及在和其他人進行各種比較對立的關係下，才得以存在的「相對」文化主體身份概念。

換句話說，內地人在思考董橋文章中與自身擁有純正的中國民族文化的異同時，也會探究其

中與西方文化的異同。所以，內地的評論大多認為內地作品中的「中國性」，顯然是設身處地在祖國生活和創作的「純正中國作家」，對中國國家民族文化產生一種天賦愛慕的自然流露之情。這好像內地的鄉土文學或尋根文學的創作，就是直接對中國傳統形而上的儒釋道或樸素自然文化的嚮往。內地作家這些「與生俱來」的「中國性」作品，無論在情感和內容上，都明顯跟董橋作為「他者遙想」的「中國性」創作不一樣。而且，內地人可透過對董橋這「他者」的想像性差異身份建構，強化和鞏固自我認同的歸屬感，是與生俱來「純正中國人」的民族身份，更可由此認同感構成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指出的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

香港即使已經回歸祖國一年，但內地人對香港作家董橋文章的理解和文化身份的建構想像，可以讓我們明白每個人都是無法脫離自己所處環境的視野局限，不管研究者是否有「大陸本位」或「香港本位」的心態和立場，都沒可能以完全客觀的眼光角度去分析問題，總會或多或少帶有自身社會文化思維模式的痕跡。當中只有在程度上受「本位」影響的深淺差別，而不是有沒有局限的差別。因此，回歸對於在香港或內地從事學術研究的人而言，最重要的是能夠以開放多元的包容態度去理解和思考有關「他者」的問題。這就如薩義德指出，知識份子最重要的是建立起雙重或多層視角，即使不是真正的移民者或被放逐者，但都應該具有這種思維方式，用另一種觀念和經驗來對照另一種觀念和經驗，也就是說，要在這參照中，了解習以為常事物的非常態。如果人們一般習慣以倫敦或北京為出發點去談論香港的話，同樣地，那又怎能反過來以香港的尺度去明瞭倫敦和北京呢？只有當人們擁有多元開放的思維模式，以寬闊的視野和坦誠的態度跟「他者」溝通交流，才能保證文化的符號和意義沒有原生的統一性和固定性，展示出真正多元共生的社會面貌。

註釋

- 1 孟冰：與董橋一起喝咖啡，《劇本》，2003年第06期。
- 2 張京媛主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28。
- 3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172.
- 4 中國內地於1997年及以後出版有關董橋的作品共22本，大部分都是經過內地編者或出版社揀選的選集，而且近年數量也大幅減少。
- 5 董橋曾在1998年接受訪問時說：「從事新聞工作這麼多年以後，我已不想再寫些空空洞洞的東西給讀者，散文單是美是沒用的，最重要的是內容，要有信息給讀者，而且應該是相當清楚的信息。再者，我盡量把文章寫得白些，希望讓更多的人看得懂。八十年代那種繡花式的散文，我會盡量少寫了。」根據趙金：走進董橋的散文世界，《中國評論》，1998年5月號，頁81。
- 6 周澤雄：面對董橋，《當代作家評論》，2001年第03期。
- 7 董橋：《從前》（*Once upon a time*），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119。
- 8 趙金：走進董橋的散文世界，《中國評論》，1998年5月號，頁79-80。
- 9 黃集偉：地下室、三聯和董橋，《中國編輯》，2005年第02期。
- 10 楊照：華麗而高貴的偏見——讀董橋的散文，《新世紀散文家：董橋精選集》，台北九歌出版社，2002年，頁27-28。
- 11 董橋曾在接受訪問時說：「現在主要是收藏硯台、竹雕、木雕、圖章這些小玩意。我自己成不

了才子，對才子留下來的東西心馳神往。」根據趙金： 走進董橋的散文世界 ，《中國評論》，1998年5月號，頁83。

12 董橋：《品味歷程：董橋自選集》，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2年，頁44。

13 同註9，頁82。

14 董橋：《倫敦的夏天等你來》（*Summer comes to London*），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136。

15 董橋：《回家的感覺真好》（*It feels good to be home*），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238。

16 同註9，頁80。

17 同上註，頁78。

18 （美）愛德華 W 薩義德著，王宇根譯：《東方學》，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頁426-427。